



“洋人眼中的西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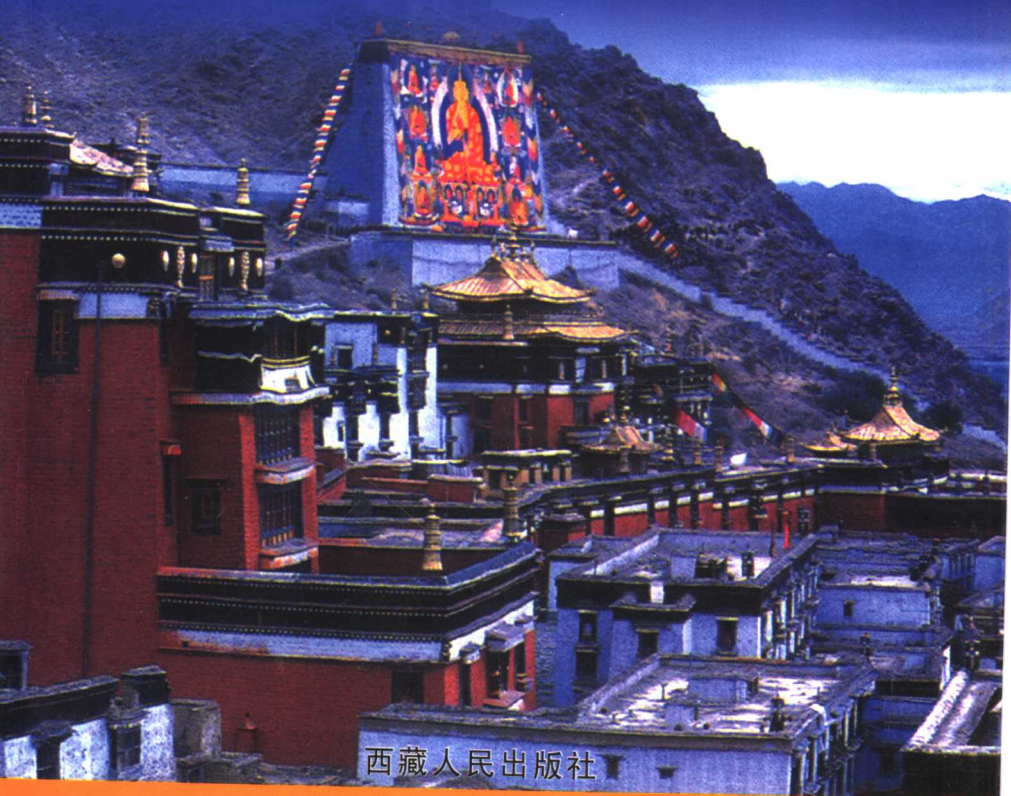
译丛

西藏札什伦布寺访问记

Xizang Zashilunbusi Fanwenji

王启龙/主编

[英] 塞缪尔·特纳 / 著 苏发祥 沈桂萍 / 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

K92
264

“洋人眼中的西藏”译丛

西藏札什伦布寺访问记

(英)塞缪尔·特纳 著
苏发祥 沈桂萍 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札什伦布寺访问记 (英)特纳著;苏发祥,沈桂萍译.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9
(洋人眼中的西藏译丛/王启龙主编)
ISBN 7-223-01735-X

I. 西... II. ①特...②苏...③沈... III. 西藏—
地方史—史料—18世纪 IV. 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5510 号

西藏札什伦布寺访问记

作 者	[英]塞缪尔·特纳
译 者	苏发祥 沈桂萍
责任编辑	叶建华
封面设计	肖 辉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 23 号)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1.625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1-3,000
书 号	ISBN7-223-01735-X/K·44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王 尧

近代以来,“西藏热”一次又一次的升温。近几年来,西藏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炒得红红火火的尤其是出版界,各种与西藏有关的丛书纷纷问世出版并且广受欢迎。走进书店,你就会发现琳琅满目的关于西藏的图书:《走过西藏》、《风情西藏》、《西藏纪行》、《写真西藏》、《聆听西藏》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走近西藏丛书”和西藏人民出版社的“风马旗书系”等等。当然,还有许多藏学译著也在源源不断地在读者面前展现出来。其中有不少国际友人和学者严谨、公允的论著早已为国人熟知,比如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时事出版社 1994 年版)和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的《现代西藏的诞生》(伍昆明、王宝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等等。

不过,在藏学译著的出版中,对于那些“百年老书”的确出版甚少,应该引起重视。

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各路洋人就开始纷纷以各种方式叩动西藏的门扉、闯入西藏的土地,这些人无外乎如下三类:

第一类是游历者和探险家,这些人怀着所谓西方“文明人”的心态来到藏区探险、旅游,将他们的真实感受和亲眼所见的情形记录下来,这些记载无疑是今天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过去之真实面貌和实际情况的宝贵材料。但由于他们自视“高人一等”,在观察

视角和描述过程中难免带有帝国主义的偏见。有时这些文明人的行为是极不文明的。比如,正是他们首先拿起来复枪向珍稀动物扣动了罪恶的扳机。这大概是他们的那些如今高喊保护动物、保护环境口号的后裔们没有想到的。

第二类是那些科学考察工作者,他们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来到环境极其艰苦的藏区进行所谓的科学考察,在动植物考察、地理勘探以及其他领域内的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留下了一大批实地考察的记录材料。尽管他们考察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为各自主子的殖民主义政策的推行搭桥铺路而来,并不是因为他们大发善心而千里迢迢来为西藏人民服务。不过,他们留下的这些材料直到今天还是颇有参考价值的。我们“拿来”用用何尝不可?

第三类就是那些野心勃勃而又厚颜无耻的军人和政客们,他们践踏了你的土地,还要强词夺理:他们本是强盗却偏把自己粉饰成君子!读者不妨打开本丛书“雪域旧旅”译丛中的《青藏高原上狩猎与旅游》一书,看看当年率兵侵略我西藏地方的大名鼎鼎的荣赫鹏上校为此书原著所写的序言是如何下笔的吧:

战争完全是一种罪恶吗?武力的使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坏事吗?这是亨利海登爵士的这本书将会引起我们沉思的问题。距本世纪初二百多年以前,一个意大利人进入拉萨,这比英国人早了一百年,比法国人早了五十年。但在上个世纪后半叶(即19世纪——译者注)的整整50年间,进入拉萨这座庄严城市的通道完全封闭了。俄国人曾试图想进入,法国人也尝试过,英国人、瑞典人和美国人都试过,但均遭到西藏人的顽强抵制。

全世界任何有良知的人们读了这段话绝对不会不为之瞠目、为之愤慨!今天我们把它译出来,当然不是赞同他的观点,而是要

让更多的人了解荣赫鹏之流的侵略者丑恶言行与肮脏嘴脸！对其遗留的思想遗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自从洋人染指西藏以来，在几百年中出自洋人手中的关于西藏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在 20 世纪初叶甚至于在 19 世纪以前出版的著作，即所谓的“百年老书”翻译出版的为数寥寥，即使有译本的也非常陈旧。而这些书籍有好些是值得介绍的，它们留下了有关西藏的非常精彩而弥足珍贵的原始记载，在西方出版后曾引起西方人的极大兴趣。普通的读者是难以见到这些封存在国内极少数图书馆的角落里的精彩著述的，只有专业人士在某些论著中引用过这些东西而已。尽管这些出版物的作者们只是从自身的角度去观察、记录西藏，尽管他们的动机未必良好，但是从这些出版物中，我们可以批判性地窥见当时西藏在某些方面的真实面貌，有些描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提供了较为原始的素材。因此，启龙同志利用工作之余，忙中偷闲，筛选部分精彩的百年老书而编成的这套译丛，由有关出版社推出，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正如主编前言中所引冯友兰先生语：“我们要想叫中国学术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相信这套译丛的出版，不但会给普通读者提供更多的了解西藏的读物，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藏学研究的发展。

主 编 前 言

王启龙

我们知道,早在清朝末期,就有贵州学政赵惟熙、刑部侍郎李端棻、清末名流张百熙等人认识到,为了民族的复兴,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方面的国际交流势在必行,故而应该设立译事机构、大力提倡译书。据冯友兰先生说,清朝译书大约三千余种。我想这与上述各位有识之士的大力提倡不无关系。到了民国时期,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冯友兰先生深感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相当不够,于是又撰文呼吁:“我觉得现在中国所最需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译书。”为什么呢?因为文化的复兴、科学的发达需要交流,关闭的国门需要打开。“在德国学术刚发达的时候,有一个人说:要想叫德国学术发达,非叫学术说德国话不可。我们要想叫中国学术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①形象生动地点明了翻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如今我们已经告别 20 世纪,刚刚跨进 21 世纪的门槛。中国已经是一个颇具国力而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当然,中国的学术在世界学术飞速发展的潮流中也在滚滚向前迈进,各个领域成就斐然。中国已经敞开胸怀接纳国外一切有用的先进的东西,中国已经阔步迈向世界!

^① 冯友兰《一件清华人当作的事情》,载《清华周刊》第 32 卷第 2 期,1929 年版,7—8 页。

但是,我们依然要说,翻译方面现有的进步还不够,现有的努力还不够。由于人们的精力有限,人们懂得的语言也有限,故而译书至今相当必要。这方面在藏学界以及其他边疆研究方面更是如此。笔者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前人及同行们在这方面的累累硕果。

改革开放以来,同其他各个领域一样,藏学界成果辉煌,其中包括藏学论著的翻译。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起由王尧先生主编、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套丛书在学术界已经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此外,中国藏学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出版了一系列的藏学专著,为国内藏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不过,这些译著中,大多数是出版年代较近的著述。出版年代较为久远、常年尘封于国内极少数图书馆的角落里无人问津的所谓百年老书大多没有翻译出版。只有少部分在解放前曾有译文,比如英人查尔斯·贝尔的《西藏的人民》(The People of Tibet)早在 1929 年就有刘光炎(题为《西藏人民的生活》,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但用文言翻译,没有现代标点,而且错误极多^①,已经不能满足今天的需要。对于未译的著述,我们必须组织力量翻译出来;对于已译有误的,必要时必须重译。

为什么我们对西方人关于西藏的百年老书如此“情有独钟”呢?原因很简单,我们需要了解过去的西藏,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的历史与现状都极其有用。此外,如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中国文化,尤其是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文化。在民族文化这个百花园中,大概最为灿烂夺目的民族文化之一就是藏族文化了。出版界介绍和推出西藏图书的日渐增多,国人对藏族文化的关切之情也绝不亚于洋人。读者渴望了解神秘的

^① 对此,李际亨氏曾经于 1932 年在《西北研究》第 3 期上撰“评刘译《西藏人民的生活》”一文予以批评指正。

雪域高原,这仅仅靠国人现在的著述和现有的译述是不够的,还需要译介更多的洋人关于西藏的著述,其中百年老书最为原始、极有价值而富有趣味但却翻译出版得较少,极难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因为国力之衰弱以及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能够有条件 and 机会进入西藏的人士寥寥无几,旧中国连温饱都难以维持的普通国人更是难以企及到雪域高原进行考察,因此国内对于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记述和研究与洋人比较而言就相对薄弱。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人”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一次又一次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和名义叩动西藏的门扉……

这些对西藏予以“关注”的西方人中,有的是不远万里而来的传教士,有的是越过崇山峻岭、冒着生命危险而来的探险家、科学考察者,有的是扛着洋枪洋炮闯入西藏这块中国神圣的领土的。他们的目的各有不同,但动机大致相当。都想在不同程度使这块雪域圣地“西化”,都想在此经商渔利,然而,令他们惊奇的是,这里固有的宗教文化是那樣的根深蒂固、那樣的难以动摇。相反,许多人藏者被西藏文化所深深吸引而流连忘返。

他们中有许多人留下了有关西藏的非常精彩而弥足珍贵的原始记载,并早已在西方出版,引起了西方人的极大兴趣,而中国学人只在自己的某些论著中引用过这些东西而已,普通的读者就更是难以见到这些封存在国内极少数图书馆的角落里的精彩著述了。尽管这些出版物的作者们仅仅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观察、记录西藏,尽管他们的动机有的不太良好,但是从这些出版物中,我们可以批判性地窥见当时西藏在某些方面的真实面貌,有些描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提供了较为原始的素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拿来”用的,只是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客观的、批判的态度。比如,从探险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鲜为人知的民风民情、奇特壮观的自然风光;从狩猎者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所谓“文

明人”当时屠杀野生动物的野蛮行径！从科学考察者在藏的记述中，我们可以读到有关西藏及其周边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的生动描述，可以读到关于美丽可爱、令人流连忘返的动植物方面的描写；从政客或军人的著述中，我们可以认清帝国主义在藏经营的真实用心和丑恶目的，同时也可以从其对当时中国政府的描述中看到，因为藏族僧俗人士对中央政府的认可使他们在藏难以顺利达到目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中国皇帝”成了他们在藏经营的绊脚石！从而可以从他们的口中证实一个铁的事实：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给广大读者及藏学界提供更多有关西藏的百年老书的翻译作品，我们在有关出版社的支持下，决定陆续精选部分已经出版百年左右甚至更早的有关藏族地区的西方论著，翻译成中文编辑出版“洋人眼中的西藏”译丛，以为国人了解洋人们是如何踏上中国土地进行“考察”的，并从他们的著作中批判性地了解当时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真实情况，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多侧面、多角度的丰富材料。相信本丛书的出版，无论是对普通读者了解西藏，对学者研究西藏都会有所裨益。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人在描写西藏时是带有他们固有的偏见或者说是成见的，我们在翻译、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对有关问题必须去粗取精，作出一定的技术性处理。我们对这些著述中常见的问题及处理办法如下：

1. 有些作者错误地将西藏作为一个“国家”处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为了尊重历史，凡是这样的地方，我们根据上下文的不同情况，统统改译为“西藏地区”、“西藏”或“藏族地区”等，并在必要的地方加以说明。

2. 有些作者对西藏各方面的了解是一知半解的，犹如盲人摸象，这样的地方为了尊重原文的真实面貌，我们照译不误，但都要加上必要的“译者注”以资匡正。

3. 有些作者在描述西藏与祖国内地之间的往来和关系时,常常将中国政府与西藏政府相提并论,将中国与西藏相提并论,这是中国人难以接受的,也是在蓄意歪曲历史事实。凡是这样的地方,我们都将“中国政府”改为“(中国)中央政府”,将“西藏政府”改为“西藏地方政府”,将“中国”改为“中国内地”等等。

4. 也有一些地方我们照译不误,目的在于真实地再现当时西方人对我国西藏怀有的不良用心,再现“文明人”的不文明行为:比如,对西藏及其周边地区(包括尼泊尔等国家)土著民众的歧视等。对于这样的地方希望读者批判性地去阅读和理解,切莫望文生义、误入歧途。

我们恳切地希望这套丛书能给广大读者带来阅读的快乐、为学术界同行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哪怕就那么一点点,我们就感到欣慰和满足了。当然,译丛难免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点,希望得到各位的指正和批评。我们会逐步改进,虽然不可能成为最好,但通过大家的努力,相信今后一定会做得更好。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这套译丛是我们已经推出的“雪域旧旅”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四川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继续。因此,由王尧先生写的总序和我的主编前言几乎没有改动。“雪域旧旅”早该在两年前出版,由于选题的特殊和技术性的问题,以及某出版社的耽误,直至前不久才由上述两家出版社共同出版,这里谨向为译丛付出辛劳的译者以及编辑们表示感谢。为了今后技术上便于处理,我们还是决定将这套译丛交由我们长期打交道,有着深厚友谊的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了有所区别,我们将译丛更名为“洋人眼中的西藏”,希望广大读者和朋友们继续关心和爱护这套丛书。我们会努力做好。

清华大学文学院

王启龙

2002年1月11日

1971 年版序言

1783 年,沃伦·哈斯汀斯(Warren Hastings)派遣他的亲戚、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武装部队的上尉塞缪尔·特纳(Captain Samuel Turner)出使西藏札什伦布寺(Tashilhunpo),庆贺 1780 年圆寂的六世班禅喇嘛(the Third Panchen Lama)转世灵童的发现。一年后特纳返回印度,继续在军队中服役。直到 18 世纪末退休。1800 年,《西藏札什伦布寺》出版发行。

迄今为止,有关西藏的一般概念皆基于传说及对事实的道听途说。现在特纳为广大英国读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见闻记载。因此,此书一经出版即受到广泛欢迎,并很快翻译为法文。

特纳并非是进入西藏的第一位欧洲人。他对西藏的访问基于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的成功出使。1773 年,波格尔奉哈斯汀斯之命出访了札什伦布。1780 年,波格尔和他的朋友六世班禅喇嘛不幸英年早逝。但直到 1876 年,波格尔生前日记才得以付梓出版。波格尔之前,从 17 世纪初叶开始,已有少量的访问者,主要是耶稣会(Jesuit)和卡普清会(Capuchim)的传教者,先后陆续到过西藏。但他们的资料最近才为人们所知。因此,特纳的著作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有关西藏的权威性著述。

无论是如何的荒诞与怪异,特纳生活的时代要求用理智的科学眼光对一切现象采取“哲学”的态度,进行“哲学”的考察。时代也赋予他优雅而崇高的散文风格。在此正规层面之后,还有些许特纳个性世界之流露。特纳正是用这些耐心而机智的品格与藏族

相处,而且能够与不同地方的人们和睦相处。但与波格尔的热情与欢快相比,特纳的举止似乎有些矜持与优越。显而易见,特纳训练有素,能够用公正之判断力,精确询访、观察和记录他自己的发现。

在其关于商业和政治报告的主要部分,特纳生动描述了他在不丹的所见所闻、札什伦布寺和拉萨之间的关系、所有西藏和中国内地之间的重要往来等。并列出了一张西藏进出口货物的详细清单。

此外,特纳对藏族生活习俗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欣赏,直到1950年,他所描述的藏族生活中大部分习俗依然如故。他对不同文化环境的迅速适应。对一些异族习俗和婚姻、尸体处理等的理智而宽容之记述,与后来有些作者的狭隘不赞成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他对藏族人的个性由衷地赞赏,虽然他并未尝试着去理解藏族信仰的实质。但他注意到了这种信仰的极其重要性和对“使宗教成为人生唯一事业的人们”之有益影响。

书中有封藏文信件之拷贝,也许这是广大公众首次目睹。但其译文似乎与另外一封文件有关。

特纳的兴趣还涉及到西藏之自然历史,包括动物、植被和矿物。风景也引起了他的注意,但由于受时代精神之影响,他宁愿赞美诗情画意和浪漫情调,而不愿对荒凉、辽阔旷野之神秘多费笔墨。虽然作品缺少波格尔随笔日记中的火花,但却感觉不到丝毫的枯燥。相反,其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精彩段落,如清晨到达札什伦布寺时对“略欠魔法”之印象、对被年幼班禅喇嘛接见一事之愉快描述等。而书中精确之旅行地图和两幅札什伦布寺的风景插图,表现了特纳作为绘图员之技艺。除了斯塔布斯(Stubbs)的一张精美之牦牛插图外,其它图示都是特纳之两名伙伴之一、天才的艺术家里奥提·戴维斯(Lieut Davis)的杰作,他没有得到离开不丹前往西藏的许可。

本书内容还包括罗伯特桑德斯医生(Dr. Robert Saunders)的一份简短的类似商业性质的报告,他被允许陪同特纳进藏。还有一份特纳本人访问札什伦布寺后对一些事情的总结报告,正是这些事情致使西藏长期对外国人封闭,并中断了西藏与外国充满前景之友好关系。这种友好关系直到 1905 年荣赫鹏(Young - husband)远征军的粗野进军结束才得以恢复。

该书的出版将使许多读者能有机会享受到有关西藏的英国文学中之精品。

赫葛·理查德
1970 年 3 月于
苏格兰法富

绪 言

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 1774 年之前孟加拉和西藏之间有任何直接的交往。客观原因之一可能是横亘在这两个地区之间的高山壑谷,但彼此相邻的不丹和孟加拉之间同样陌生异常。所以崇山峻岭并不一定表示不同或至少相同的原因。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最可能的原因存在于征服精神,这种精神形成了所有伊斯兰(Mahometan)国家的普遍特点。在这些国家,其宗教普遍仇视所有的异教徒。被认为强悍勇猛的菩提亚人(Booteas)对战争艺术却不甚精通,他们分散居住在崇山峻岭之中,依赖这种生存环境抵御外敌入侵。如果允许外人自由通过他们的领土,他们就会不可避免地失去已拥有的优势。目前,其北部土著居民对与印度居民之间的往来持有强烈的嫉恨心理。的确,现在一支不丹商队每年到孟加拉的绒波尔(Rungpore)一次,此商队用马匹运来桔子、胡桃和本地制造的粗糙木制品等进行出售。一个月后,又带着棉布、盐和和其它孟加拉的土特产运回不丹。但不丹政府从不允许孟加拉居民拥有同样的特权。或许有些不丹人比孟加拉人更赋有创业精神,他们试图克服上述阻力。有些宗教团体的成员不时往来于不丹与西藏之间。普南吉尔(Poorungheer)便是其中一人。1773 年他陪同第一个代表团从西藏到孟加拉,之后他又加入了班禅(指六世班禅喇嘛——译注)赴北京访问的队伍。当然,伴随着上面提及的政治因素,由于两国举止和环境之不同,而造成的某些东西导致了同样的效果。很难想象地球上其它边远地方居民间的

差异同身体羸小而性情活泼的孟加拉人与其身手敏捷崇尚武力的邻居不丹山地居民之间的差异相比,区别究竟有多大。对言行举止具有很大影响的宗教对这两个民族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虽然其宗教渊源相同。从其海拔高度讲,不丹地方如此之寒冷以致于其南方邻居很少能够忍受。而不丹居民身着毛织衣褐,很难习惯孟加拉人一贯讲究之洁净,更无法忍受孟加拉潮湿和曝晒之气候环境。两国居民健康方面的差异很大。所以,同样原因导致了这两个国家的居民体格与道德规范方面之差异,而后者很大程度上是前者的结果。

不丹境内的山脉形成了巨大山脉链之一部分,此山脉链地理学家们称之为喜马拉雅山(Himalaya)。喜马拉雅此一名称是婆罗门(Brahmens)神话历史中经常提及的伊玛奥山(Mons Imaus)的统称。山脚下,是一片森林覆盖沼泽星布的辽阔而平缓的平原,这便是孟加拉和不丹之间的自然分界线。此处不适宜人类生活,基本上荒无人烟。但1772年,不知出于何人的要求或受了什么刺激,不丹大君宣布拥有与孟加拉边境毗邻的库赤巴哈尔地方,且并未遇到多大抵抗便迅速占领了此地。这导致了两国之间的第一次对立情绪。这种对立最后发展为武装冲突。孟加拉政府虽从争端地区没有任何利益可得,但对此事求之不得。它派一支步兵先遣队驱逐入侵者,不丹人被赶回了他们自己的边境。而孟加拉的这支先遣队逐渐由几个连扩展为两个营。

菩提亚人的武器是弓箭、短剑和一种类似修剪树枝用的刀。虽然他们勇猛无比勇往直前,但根本不是训练有素且大炮助阵之孟加拉军队对手。把菩提亚人从有争议的地区赶走后,孟加拉军队在疾病肆行的地方继续同更加凶猛的敌人战斗,以继续扩大他们的战果。厌倦了战争和虑及自身国家的安全,不丹大君向札什喇嘛(即六世班禅——译注)求救,喇嘛答应坐禅为其祈求和平。

彼时,班禅喇嘛是西藏的摄政王,达赖喇嘛的监护人。达赖喇

嘛年纪虽小,但其宗教地位至高无上。班禅喇嘛年龄 40 岁左右,在其所属范围内受到普遍的尊敬,同时也因其高雅的举止和慷慨的性格而受到人们的广泛爱戴。凡与其接触之人,都成为他的崇拜者。所以,班禅喇嘛以其自身性格的魅力将西藏地方的宗教和政治力量统一在一起。的确,政治上,班禅承认清帝国的宗主权。清朝有一个代表(驻藏大臣——译注)和少量的军队(我想大约是 1000 人左右)常驻达赖喇嘛的首府拉萨。但此代表很少干预西藏地方政府内部之事。

被不丹大君的诚意所感动,同时也出于对西藏的附属国不丹的安全之考虑,班禅喇嘛派遣一个代表团带着他写给印度总督的亲笔信前往加尔各答。在此我愿引用这封信,作为班禅喇嘛和朴素的情感和表达细腻的见证,同时它也以谦虚和虔诚祈求的方式传达了一种威胁。

札什喇嘛给孟加拉威廉城堡之总督和行政长官沃伦·哈斯汀斯之信件译文,收信日期为 1774 年 3 月 29 日:

“愿此世间万事万物吉祥昌盛:吾日夜为汝之幸福与繁荣祈祷。从尔地来的商人口中,得知汝之崇高大名与声誉。如春天盛开之花朵,吾之心充满了满足与欢乐。愿佛保佑,汝之幸运之星冉冉高升!愿佛保佑,吾之家庭与周围之人幸福安康!烦恼和痛苦皆非吾之目的,更非吾之教派之特点,如伤及哪怕一个小小的生命,吾等连必需之睡眠饮料都戒喝。但吾被告知,在正义和仁慈方面,汝比吾等更胜。愿汝以宽阔无比的胸怀装饰权利与正义之宝座,享受财富与和平之祝福!托汝之洪福,吾为雪域此地之喇嘛和人王,统领此地百姓民众,此地情形想必汝已从此地去的旅行者口中熟知。吾被不断告知,汝对德泰拉(Deh Terria)采取了敌对行动,且据说是由于德泰拉在汝之边境地方抢劫和所犯其它恶行所致。因德泰拉为一鲁莽与无知之人,昔日同样之错误也所犯不少。皆因其贪婪所致。他现在故伎重演也完全可能。其在巴哈尔和孟